

乾隆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政策探析

褚宏霞

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天山南北后,为填补新疆战后出现的人口空缺,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对迁居的内地移民,包括普通户民、商民、遣犯等制定了相应的落籍政策,迁徙新疆的不同移民群体陆续转换了移民身份,顺利落籍新疆。这些应时应势落籍新疆的移民不仅充实了新疆户籍人口,而且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键词 乾隆时期 新疆 移民 落籍政策

作者褚宏霞,1983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邮编100005。

清代的户籍制度规定“人户以籍为定”,^①严防脱漏隐匿,为的是户民有籍可依,并以此限制人口的迁徙、流动。但是,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人口的流动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尤其清代中期后,内地人口的迁徙流动日益普遍化,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清朝在统一新疆后,应势对新疆实行了积极的移民政策,并为移民群体顺利落籍,逐步确立了新疆的户籍制度。以往学术界对清代新疆移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背景的分析、人口迁移规模、屯垦活动、移民对迁入地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②对于新疆移民的落籍情况及清朝对不同移民群体所实行的落籍政策则少有探究。^③因此,本文旨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重点分析乾隆时期对新疆不同移民群体所采取的落籍政策,以期有助于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① 《大清律例》卷8《户律·户役》,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② 对新疆地区移民的研究成果较多,从屯垦角度探讨的,如方英楷的《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王希隆的《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儒生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从经济开发角度探讨的,如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马汝珩和成崇德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成崇德的《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蔡家艺的《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有不少直接探讨新疆移民活动、人口变迁的论文,如阚耀平的《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干旱区地理》2003年第4期)、吴轶群的《清代伊犁人口变迁与人口结构》(《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赖洪波的《论清代伊犁多民族移民开发及其历史意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等。

③ 落籍,指落入新疆民籍。据《嘉庆会典》记载,清代的户民分隶于民籍、商籍、军籍、灶籍,其中民籍是清代户籍制度的主体,除军、商、灶籍之外的户民都人民籍。参见《大清五朝会典·嘉庆会典一》卷11《户部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40页。

一、乾隆时期新疆实施的移民政策及原因

乾隆二十四年(1759),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终实现天山南北统一,但经过数十年的战争,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尽显地广人稀、经济残破的景象。为填补新疆战后出现的人口空缺,满足恢复社会经济所需的劳动力,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清朝对新疆实行了积极的移民实边政策,除满族、蒙古族、锡伯族等军事移民外,关内移民,如普通户民、商民、遣犯等陆续进入新疆,从事垦殖、商贸等活动。

对新疆实行积极的移民政策,早在乾隆统一新疆前就已酝酿。乾隆二十一年(1756),西北战事还在进行时就已有官员提出在新疆屯田以解决兵饷问题。乾隆二十三年(1758),统一新疆的战事进入尾声,陕甘总督黄廷桂毅然奏议在新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而乾隆皇帝在统一新疆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西北若安定、发展,驻兵屯田不失为良策。因此乾隆二十五年(1760),针对范时绶、黄廷桂等再次提议于新疆广开兵屯、移民实边,^①乾隆皇帝给予肯定,并认为在内地生齿日繁的情况下,“西陲平定,疆宇式廓,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存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②可见,乾隆皇帝不仅认可了大臣奏议,还认为移民新疆大有利益。因此,对于当时朝野中关于移民屯垦新疆是劳民伤财的议论,乾隆皇帝都给予了驳斥,^③并指出以“西域治西域,而经费不取于中土”^④的移民屯田措施,既可以减轻内地生齿日繁的生存压力,又可以使内地百姓在新疆“各成聚落”,成为守疆卫土的重要力量。^⑤乾隆皇帝的这些意见充分表明了他对移民新疆可行性的高度认可,而高层统治集团的支持与认可是新疆在有清一代实行的移民政策不同于蒙古、东北地区的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清朝对新疆实行不同于其他边疆重地的移民实边政策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战略地位重要,对与之相邻的漠南、青海、西藏、陕甘地区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对外而言,移民实边新疆可防沙俄入侵。^⑥所以,清朝统治者从西北为国家之根本的认识出发,鼓励内地移民到新疆生产、聚集,如此“日久则各保田庐,即可永资捍卫,于边防大有裨益”。^⑦

二是保障军备所需。清朝在新疆要地派驻军队,必须有够强的经济支撑,其中粮草的供应尤其重要。新疆地处西北,从内地供应粮草要受地理环境、交通的诸多限制且花费巨大。

① 范时绶:《奏为新辟疆土招民开垦敬陈管见事》(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31-007。以下未注明者均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清高宗实录》卷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庚申。

③ 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3页。

④ 《西域图志》卷31《兵防》,《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第67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⑥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692,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乙酉。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黄廷桂曾言,从肃州运粮到哈密,转巴里坤,一石粮即需脚费10两,每年运粮的交通费用就达10万余两,“经费实属浩繁”。^①但移民屯垦,既可以边养边,所收粮赋足以提供驻防所需,又可省却内地输运之烦。

三是填补新疆人口空缺和缓解内地人口压力。新疆尤其北疆地区经过平准战争及疾病的发生,人口损耗严重,要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就必须补充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实行移民屯垦,不仅可以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还促使内地民人在新疆“成家室而长子孙”,“茆檐土锉,各成聚落”,增加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从而符合“国家牧民本图”,^②达到既实边又生养腹地无业贫民的双重效果。^③

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清朝对新疆采取了积极的移民政策,倡导组织内地人口到新疆垦殖落居。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内地户民被官方大批招募到新疆,陆续在乌鲁木齐一带落籍。官方组织迁徙移民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之后以自发方式迁徙的移民逐渐成为移民主体。而从官方组织移民伊始,商民、遣犯也陆续迁入新疆,并多在北疆入籍。虽然新疆移民政策在具体实施上经过了时间、地域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无论移民是官方组织还是自发迁徙,清朝都采取了积极的落籍政策,以确保移民成果的巩固。移民落籍政策的实施,不仅推动了乾隆时期新疆移民的顺利进行,也促使新疆移民社会逐渐形成。

二、乾隆朝对不同移民群体的落籍政策

乾隆时期,内地人口在政府积极的移民实边政策下陆续迁入新疆。为尽快充实新疆人口,清朝对不同的移民群体,即内地普通户民、商民、遣犯等都制定了相应的落籍政策。

(一) 内地普通户民

内地普通户民,主要是指由内地迁往新疆的普通贫民或无业者。按迁移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即官方组织和自发迁徙。清朝依迁移方式的不同,对他们在新疆的落籍政策也有所不同。

第一,官方组织移民的落籍政策。

官方组织户民迁居新疆,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朝在新疆兵屯取得实效后,开始筹备内地户民的迁移屯垦事宜。移民决策下达后,陕甘总督杨应琚即奉命到甘肃招募户民,并于乾隆二十六年八九月间,在安西、肃州、高台、武威处募得贫民及无业者200余户,约700余人。^④随后,这些户民被分作4批,由官方护送顺利到了乌鲁木齐,并被逐一妥善安插。^⑤这是清朝招募、安插的第一批内地移民。

① 管陕甘总督事黄廷桂:《奏为筹办巴里坤驻防兵粮请先设屯田以省运费折》(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四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5辑,“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第673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③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77,乾隆三十六年正月戊辰。

④ 参见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报料理续往乌鲁木齐种地户民起程事》(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0524-064;《清高宗实录》卷645,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丁巳。

⑤ 参见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报乌鲁木齐三次续招户民数目暨分起料理起程事》(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31-017。

户民到达迁居地后,从生活到生产都由官方负责。官方首先按户借给粮食,每户大口日给白面一斤,小口减半,等秋收后交还。^①然后,按户民实际承受能力,“酌量每人或十亩或十五亩,视其力之所能,拨给地亩,赏给农具、籽种,每户借给建房银二两,并于换获哈萨克三等马内,每户给马一匹,作价八两”,所拨土地为六年升科,所给房马价银分年次归还。^②移民的户籍,一般也由官方安排,直接落入迁居地。移民在未迁入前,政府已经确定好了他们的落籍地,移民到新疆后可直接安插落户,造册存档。可见,移民的户籍从其迁移开始,就已经由官方从原居地移到了新居地。在对迁居户民的管理措施上,可以反映清朝对这些移民的落籍政策。

乾隆三十一年(1766),陕甘总督吴达善上奏了《酌定木垒安户章程》,其中规定:“一、新安户口,宜编立里甲。请按每年招徕户民,编为一里,一里之中,分为十甲……酌定里名,以分界限。一、每里应选立里长、渠长、保约。请按每里设里长一名,每百户设渠长一名,乡约、保正各一名,给以委牌,俾各有职掌,如果勤于劝导,照内地例给匾奖励。”^③从该安户章程可以看出,清朝对这些迁徙到新疆的内地户民并非看作一般的移民,对他们实行里甲制,并按内地例管理,是从一开始就将迁居的户民作为新疆户籍成员对待的。所以说,清朝对这些内地户民的落籍政策,就是将其户籍直接从原居地落到新疆户籍体系。

移民户籍直接由原居住地迁到安插地的政策,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开始,持续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而止。这与官方大规模的组织性移民活动的结束有关。但是,随着自发性移民活动占据主导地位,清朝随之制定了与之相关的落籍政策。

第二,自发迁徙移民的落籍政策。

清朝对自发迁徙到新疆的内地普通户民,所采取的落籍政策主要为升科纳粮,即移民可以承垦土地升科的方式而入籍迁居地。新疆的移民,主要来自陕甘地区,多因原籍无地可垦,生活没有保障而选择移居外地。因此,清朝在新疆招民屯垦时,将以前军事性质的屯田改为升科之田,意在增加赋税的同时,便于移民将所垦土地合法化,从而通过升科纳粮的方式,转换移民身份,落入地方户籍体系。

自发迁徙到新疆谋生的内地户民,或以户结伴而徙,或零散前往,虽然有内地送来、内地迁来、本地招募、本处认垦等几种方式,但从政府角度来说,对他们的落籍政策都是升科纳粮。在升科年限上,清朝在移民初期规定“所属户民垦种地亩定限六年升科,安插为民人户垦种地亩定限三年升科”。^④而土地升科时,移民也就被登记造册报部,即正式落入当地的户籍体系。这一规定也为以后各朝所遵循。不过,移民在新疆的承垦情况不一,土地升科年限略有不同,所以落籍的实际情况也不同。

北疆地区在乾隆朝一直是移民迁居的主要地区。乌鲁木齐及其所属州县,迪化州、昌

① 参见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奏为遵查甘肃被灾并伊犁安插户民实在情形据实奏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37-045。《乌鲁木齐政略·户民》(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对此也有记载。

② 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乌鲁木齐办理屯田事务李景高等:《奏为新疆户民升科事宜事》(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32-004。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6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775,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乙丑。

④ 《户部则例(二)》卷8《田赋二下·升科定限》,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558页。

吉、阜康、绥来、宜禾、奇台等地都是接收内地户民最多的地区。^①对于内地初来户民,地方官基本上按照移民早期定例,给予资助,并每户拨地30亩,土地六年升科后,即由政府将符合升科条件的户民编册入籍。如乌鲁木齐自乾隆三十年(1765)由内地迁来户民140户,垦地43顷3亩,与三十四年(1769)限满准入民籍户民38户及宁边城由内地迁来的866户,俱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为始入额起科,每亩输纳京斗细粮米面8升,由地方官造具册结入籍,再呈送户部户科。^②乾隆五十三年(1788),乌鲁木齐所属芦草沟、塔西河有民人23户,认垦地亩693亩,也是照例六年升科入籍。^③在乾隆朝,北疆初来户民的落籍多如此,但乾隆朝后期逐渐出现了因土地性质而调整升科年限、科则的情况,移民的落籍也随之出现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承垦原兵屯土地的户民上。

随着移民户屯的日益发展,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兵屯逐渐弊端显现,新疆屯垦形式的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清朝鉴于户屯的发展与兵屯的衰落,从乾隆三十年(1765)开始,实行裁屯改户,即将原兵屯地裁撤,改招户民垦种。木垒地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裁撤屯兵;玛纳斯、济木萨地区的屯兵分别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十六年(1791)裁撤。清朝将屯兵裁撤后,便将遗下的屯地转交内地移来户民承垦。因为原兵屯地亩系熟地,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物力、人力,所以清朝规定土地为一年升科,户民的落籍也在一年后。如济木萨地区在屯兵裁撤后,所遗地亩经乌鲁木齐都统尚安奏明交地方官招募商民、户民耕种,乾隆五十七年(1792)济木萨县丞将土地拨给安插的王朋等311户耕种,每户拨地30亩,共9330亩,规定每亩纳粮京升小麦9升6合3勺,于五十七年起照数输纳后,造入该处地粮奏销册内。^④可见,承垦裁屯地的王朋等311户户民,在认垦之地当年升科纳粮时,即被登记造册而入籍济木萨县。

新疆的移民屯区每到升科之年,地方政府都派官员负责查报地亩,对到升科年限的地亩进行清丈核查,并将户民人口情况登记造册,然后移咨陕甘总督和户部。经过升科、造册的过程,从内地迁徙到新疆的户民才正式加入新疆民籍。

(二) 内地商民

早在清朝决定移民新疆之前,就已有商民随军到新疆贸易,清朝也非常支持商民入疆贸易谋生。^⑤这些商民在新疆的落籍多通过两种方式:经营地产,由商转农;商农合体。^⑥不

① 据《伊江汇览》载,乾隆四十年左右伊犁的户屯才有发展。该书载,伊犁户屯耕种有稻地53316亩,之后续开三棵树、阿奇乌苏、大榆树等处178690亩。(清)格琿额:《伊江汇览·屯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05页。

② 参见陕甘总督明山:《题为乾隆三十年等年乌鲁木齐招募民户及准入民籍户民各地亩请于本年入额起科事》(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户科题本,档号:02-01-04-16212-027。

③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26,乾隆五十四年四月癸巳。

④ 参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题为遵议乌鲁木齐所属济木萨县安插民户王朋等耕种纳粮于乾隆五十七年升科事》(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户科题本,档号:02-01-04-17664-024。

⑤ 如在统一新疆过程中,清廷会允许商人携带货物到军营贸易,以供补军事物资。参赞大臣策楞:《奏补给官兵之口粮羊只未送达军营已令商人携货来营贸易片》(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410页。

⑥ 关于清代新疆的商民等移民群体的落籍方式,参见祁美琴、褚宏霞:《清代嘉道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方式初探》,《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

管以何种方式,清朝都在积极的移民政策下,鼓励商民到新疆落居,而且对其落籍政策也是非常宽松。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谕旨杨应琚到甘肃招募户民时,有原山西临晋县商民卢文忠一户5人,呈请自备车辆路费携眷迁居。杨应琚对卢氏的行为非常赞赏,并上奏乾隆皇帝:“卢文忠既系有资本之户,因感蒙圣主晓谕招垦情愿自备资斧携眷前往,实堪为腹地商民之倡率。”^①最后,卢文忠一户也在杨应琚的安排下,与官方所招之民一起起程赴乌鲁木齐安插,并直接落籍。在政府的鼓励下,内地商民到新疆承垦的越来越多。他们的户籍一般也与迁居的户民一样,在承垦之地升科后即落籍当地。不过,在不同地方,政府依情况对商民采取的落籍政策略有不同。

乌鲁木齐地区,是商民迁居的主要地区。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陕甘总督文绶奏报奇台附近之商人188户呈请垦地后,“先后在于奇台、东吉尔玛泰、北滩、西泉、中泉、东泉、牛圈泉、白杨河等处共垦田七千三百七十五亩”,俱编入民籍。^②为办理商民承垦、入籍事务,文绶会同巴彦弼、明山等依据地方情形议定:“嗣后凡有商贾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与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久远管业。”清廷对他们的议定非常认可,并允准以后“商民乐于承种”,“应如所奏办理”。^③不过,清朝对呈请垦地并以此落籍的商民有一个限制条件,即商民需携眷。商民如果呈请落籍新疆,需携带家眷;如眷属在内地,落籍前也需搬眷。这是清朝基于商民贸易来往不定会不利于形成定居民的考虑。乾隆五十二年(1787)陕甘总督勒保奏绥来县有袁天载等108户商民在地方贸易多年,俱有眷属,愿承垦地亩入籍地方。清朝因他们俱系携眷商民,可以久远承业,因此允准绥来县给他们拨地,并纳入地方民籍。^④对于愿意搬眷入籍的商民,清朝还实行灵活的落籍政策,并提供经济帮助。乾隆四十一年(1776),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奏报乌鲁木齐地方有1540户只身出口佣耕者,愿意搬眷认垦入籍,其中有207户在该地居住时间较长,以“手艺、贸易生理”,已有资财积累,能自己搬接着属。清朝遂允准这些人将眷属接到后,拨地并“按照定例添入民籍”。对于积蓄不多的987户,清朝允许他们二三年后生计充裕再搬接着属入籍。其余的346户,因属赤贫,无力搬眷,所以允准地方官按照内地招徕贫民送出口之例,官为资送,到达迁居地后,由官府照例办理落籍手续。^⑤乾隆四十三年(1778),乌鲁木齐又有愿赴内地搬眷商民1540户,清廷谕旨赏给搬眷车辆盘费,昌吉、阜康等县官还将所需房间代为建盖,马匹、籽种等也在眷口到来前备好。^⑥由此可见,

① 陕甘总督杨应琚:《奏为奉谕先后招募腹地无业游民分批委员送往乌鲁木齐垦荒立业并现仍办理缘由事》(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23-0042-001。

② 参见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四月二十八日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48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909,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戊午。

④ 户部尚书巴延三:《题为遵旨议奏陕甘总督题乌鲁木齐所属绥来县招募商民拨给地亩入额升科事》(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户科题本,档号:02-01-04-17646-010。

⑤ 《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为遵旨查明搬眷户民分别办理奏折》(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徙民屯垦新疆史料》,《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

⑥ 参见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奏为安插搬眷商户事宜事》(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37-011。

清朝从上至下对商民的承垦落籍是非常支持的。

伊犁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官方移民迁居较晚,但是商民却迁居的较早。清朝对到伊犁屯垦的商民不仅予以支持,而且对他们的户籍管理也如同普通户民,所垦土地升科后即直接纳入地方民籍。据《新疆识略》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商民张子仪等32户,报垦土地39618亩6分,每亩征银5分。^①同年,还有商民张尚义等200户承垦荒地稻田10668余亩,每亩征银1钱。^②乾隆三十七年(1772),庄世福等48户呈请拨地开垦,于当年升科后,当地政府即将他们落入地方户籍,并规定他们“永为土著”。^③由此可见,清朝对伊犁地区的商民承垦采取了积极、灵活的措施,从商民承垦的地亩并没有拘于30亩之数,可见一斑;同时对商民的落籍政策也很宽松,所垦土地“报垦升科,永为土著”,^④不拘于成例。

在巴里坤地区,清朝对商民的呈请垦地、入籍也是采取鼓励政策。乾隆二十六年(1761),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请将巴里坤可垦之地允许商民认垦,并给以执照,分别年限升科,以使流寓贸易之人迁居而渐成土著。^⑤乾隆皇帝对此建议非常认可,并谕旨“应广为劝垦者”。^⑥在清朝的鼓励下,商民承垦、入籍很顺利,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巴里坤的96名商民,被允许所垦地亩照水田例六年升科纳粮后入籍地方。^⑦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奇台贸易的商民芮有等30人,经陕甘总督吴达善奏请,被允许承垦后“与安插户民一体按限升科”^⑧,落入地方民籍。

由上可见,清朝对商民的落籍是非常支持的,但相比内地普通户民,比照升科之例时,清朝还要求商民携眷。商民有眷而又在新疆立有家业,一般会很容易被政府“俱编入民籍”。^⑨乾隆时期,在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下,商民落籍新疆的人数非常可观。到乾隆六十年(1795),乌鲁木齐所属地方入籍商民有11545户,共43791人;^⑩如果算上伊犁地区的商民,约有1.2万户。

(三) 遣犯

在新疆的移民群体中,遣犯及其眷属是被官方以强制性手段移送到新疆且带有罪犯性质

① 参见(清)松筠:《新疆识略》卷6《屯务》,《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1卷第1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② 参见(清)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7《屯务》,《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新疆史志》第3部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391页。

③ (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卷3《伊犁兴屯书始》,《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新疆史志》第2部第3册,第1363页。

④ (清)徐松:《新疆赋》,《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新疆史志》第2部第14册,第629页。

⑤ 参见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报巴里坤豌豆收成成分并酌请听民广垦事》(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9983-016。

⑥ 《清高宗实录》卷645,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丙辰。

⑦ 参见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报新疆北路巴里坤续垦地亩数目事》(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23-0051-004。

⑧ 陕甘总督吴达善:《奏报商民认垦新疆地亩事》(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0821-041。

⑨ 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四月二十八日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48页。

⑩ 参见(清)永保:《乌鲁木齐事宜·民户户口》,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27页。

的移民。由于罪犯的特殊身份,清朝对他们在新疆的落籍政策有别于普通户民、商民。

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采纳御史刘宗魏的建议,“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始被发遣到新疆服役。这些发遣新疆的罪犯,在发配地会根据所犯情罪的性质、轻重,从事种地、当差、给兵丁或伯克为奴等。而清朝对遣犯的落籍政策也依据遣犯的罪情及服役性质略有不同。

首先,对于发往新疆从事耕种的普通遣犯,清朝一般会视其原情罪轻重,拟定年限,规定遣犯服役期满准入民籍,^①但前提是遣犯必须在配所安分服役,且服役期间没有再犯过错。乾隆三十一年(1766)规定:“视其原犯情罪轻重,将原拟死罪者,作为五年军流,轻者作为三年,年满无过犯者,陆续编入民册。”^②也就是说,清朝对普通遣犯在新疆的落籍政策是遣犯依情罪服役五年或三年,期满无过,允准转入民籍。

为达到增加新疆人口的目的,清朝还积极鼓励遣犯携眷,并对遣犯眷属实行了积极的落籍政策。对按例应携眷的遣犯,官方会提供一些盘费、车辆等资助遣犯迁徙,如果遣犯及其眷属在发配地安分守己,并能改过,则“拟定年限,给与地亩,准入民籍”。^③未携眷的单身遣犯,清朝在初期规定遣犯服役期满,符合入籍条件的单身遣犯,需将眷属搬到配地后,再落入当地民籍。不过,乾隆三十五年(1770)经乌鲁木齐提督巴彦弼等奏请,单身遣犯“实在悔过迁善,尽心屯种,照前定年限,与有眷者一体为民”。^④至此,服役期满后的单身遣犯,获得了和有眷遣犯一样转入民籍的权利。

对于遣犯携带的眷属,清朝依据实际情况,对他们的落籍分别有相应的规定。其一,已服役年满入民籍的遣犯,若身故,“妻子已入民籍,即照民例办理”各项事宜。^⑤其二,遣犯在未满服役年限以前病故,其妻子照年限已满例,一体入民籍安插。^⑥其三,遣犯未到配所而身故,其妻子或情愿到配所为民者,令地方官讯明,仍行发往,并入于各该处民籍,安插耕种。^⑦

其次,对于发配当差的遣犯,清朝也规定了相应的落籍政策。在乌鲁木齐矿场,挖矿、种地、捐贖的人犯,清朝“始议五年为民,八年回籍”,后更改为:“原发当差者,在厂五年期满,咨部为民;仍愿在厂,再限十年,期满回籍”。^⑧在铁厂劳作的遣犯若有老弱不能力作者,可以通过捐贖方式服役,“应三年为民者改为二年,应五年为民者改为三年”。^⑨对于厂中的捐贖遣犯,《新疆条例说略》也载:“系当差人犯,五年期满准其为民,再效力十年准其回籍。”而对无力捐贖入厂又安分守法者,如果已过十年,清朝规定有“年力强壮者仍留各该处,归入内地送往种地民人之内,起除刺字,俾令永为良民”。^⑩

① 参见《大清五朝会典·雍正会典(一)》卷27《户部五·开垦》,第333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768,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壬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庚申。

④ 《清高宗实录》卷851,乾隆三十五年正月甲辰。

⑤ 《清高宗实录》卷780,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乙丑。

⑥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80,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乙丑。

⑦ 参见《大清律例》卷4《名例律上》,第103页。

⑧ (清)永保:《乌鲁木齐事宜·铁厂》,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39页。

⑨ 佚名:《乌鲁木齐政略·铁厂》,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74页。

⑩ 佚名:《乌鲁木齐政略·刑名》,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23页。

在伊犁地区矿厂,从事开矿、种地的遣犯,转入地方民籍的规定也如乌鲁木齐铁厂的规定,如果遣犯能实力开采,凡免死减等,例应五年为民者减二年、三年为民者减一年。^①

对于罪行较重,被发遣永远当苦差的遣犯,清朝规定,此类遣犯若用心当差、痛改前非,也可服役三年期满后转人民籍。^②

最后,对于发遣新疆服役的遣奴,清朝对他们的落籍规定也是依据服役年限,但一般都较普通遣犯严格。

在清代,发遣为奴者多属情罪重大,且为“桀骜难驯,屡惩屡犯”^③之犯。《大清律例》规定:“发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为奴人犯,令该管大臣均匀酌拨与察哈尔兵丁及种地兵丁为奴”,^④其中察哈尔兵丁若永远驻防,则发给的人犯永远为奴。种地兵丁如果属换防兵,奴犯则换防时交给下一班换防兵。可见,发遣新疆为奴的罪犯,其身份非常特殊,一般不准许再回原籍,甚至罪行较严重者遇赦不赦。不过,鉴于新疆在开发中对人口的需求,清朝对遣奴的政策也做了适当调整,以利于遣奴转换罪犯身份,转入地方民籍体系。乾隆三十五年(1770)经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原发给兵为奴人犯,量其情罪轻重,年满保送为民,给与籽种、牛粮开种,次年计亩纳粮”,^⑤即为奴人犯如果在配所安分守己,情罪稍轻者也可服刑一定年份后除去罪奴的身份,转人民籍。这些情罪稍轻的为奴罪犯,服役年限和普通遣犯相似,一般是“五年期满,如愿为民,一体安插”。^⑥

对捐贖、在厂服役的遣奴,清朝规定除特旨发遣为奴、大逆缘坐之奴等外,“有捐贖入铅铁等厂效力者……如系为奴人犯,五年期满且准改入民户册内,不准回籍”。^⑦在乌鲁木齐铁厂,“原发为奴者,在厂五年期满,咨部为民,复核案情轻者仍准留厂,十二年期满回籍;案情重者不准为民,不准留厂回籍”。^⑧在伊犁地区,“发来给兵为奴,拨入铜厂、铅厂、宝伊局、船工者,五年后,具奏为民”。^⑨

由上可见,清朝对遣奴的落籍政策也是灵活的,若是情罪较轻的遣奴,都可通过在配所安分服役或在厂矿中劳作、捐贖,五年期满后转人民籍。而情罪较重的遣奴,如果落籍,需要服役的年限一般都很长,乾隆三十五年(1770)“定为十年期限”,^⑩年满视情况方可保送为民。

此外,对于立功的遣犯,清朝会直接越过服役年限,将他们转入地方民籍。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新疆的遣犯史二、莫绍仁因拿获逃犯徐四有功,被特赦免罪入了当地民

①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917,乾隆三十七年九月辛亥。

②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75,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未。

③ 《清高宗实录》卷632,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庚子。

④ 《大清律例》卷5《名例律下》,第143页。

⑤ 《伊江汇览·屯政》,《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辑》,第69页。

⑥ 《清高宗实录》卷1201,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丙午。

⑦ (清)吴翼先辑:《新疆条例说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3卷第10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78页。

⑧ (清)永保:《乌鲁木齐事宜·铁厂》,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39页。

⑨ (清)永保:《总统伊犁事宜·粮饷处应办事宜》,《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辑》,第260页。

⑩ 《清高宗实录》卷875,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未。

籍。^①此后,清朝规定“发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处遣犯,如在配所安分,复能将该处脱逃遣犯拿获者……其获犯之遣犯无论当差、为奴不拘年限准为彼处之民,不准回籍”,若为民后,又拿获脱逃遣犯,则可获准回籍。^②

在新疆,还有一类以罪犯身份迁居到新疆的安插户,他们介于遣犯和普通户民之间,清朝虽然将他们按民屯例进行安置,但落籍政策却是强制性的,即直接落籍,与遣犯和普通户民等都不同。^③

乾隆时期,清朝对遣犯为民政政策的实施,不仅增加了新疆户籍人口,还达到了化罪犯为良民的目的。对于落籍遣犯的人数,没有史料直接记载,但可以据史料推测。乌鲁木齐地区,据载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已有为民遣犯1243户,^④那么到乾隆末年为民遣犯应不少于2000户。伊犁,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接收遣犯,据载“自三十五年起,每岁保送为民者数十名……五年之内,计为民者二百二十五名。”^⑤五年时间,为民人数达225名,若照正常发遣情况推算,到乾隆末年伊犁地区的遣犯为民者约达1200人。

(四) 绿营官兵眷属及其子弟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开始大规模派驻绿营兵丁到新疆驻防屯田。新疆的绿营兵丁驻防,始定换防制,驻守兵和屯兵都是三年或五年一换。为了添增新疆人口,“生聚畜牧”,清朝对绿营驻防制做了调整,以使绿营官兵眷属及其子弟落籍新疆。

首先,鼓励绿营官兵携眷驻防,将换防改为携眷永驻。在新疆驻防伊始,清朝就允许绿营官兵携眷驻防,意在其“携眷永居,不但有裨屯田实效,将来子弟多添设土户,亦复有益边疆”。^⑥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准许屯兵中“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行准其带往……既有家口,分地垦种,各安其业”,^⑦并给予迁移费用、车辆资助。如乌鲁木齐的驻防兵丁有愿从内地搬眷者,由驻扎大臣发给搬眷盘脚银两,每家口三人给车一辆,大口支口食银一钱二分,小口减半。^⑧对这些随驻防兵丁而迁居新疆的绿营眷属,清朝都直接将他们“俱归民籍”,^⑨即采取直接落籍政策,安插在驻防地,按户民例拨地垦种。在政府的鼓励、资助下,北路各驻防地的绿营官兵陆续携眷告驻,官方“为之津送,岁岁有之”。^⑩据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乌鲁木齐有281名兵丁携眷告驻;^⑪乾隆四十三年(1778),伊犁屯

①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271,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己未。

② 《大清律例》卷5《名例律下》,第144页。

③ 在乾隆时期,以安插户身份而被清廷强制性落籍新疆的移民有三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的吴姓大族,30余户,约100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甘肃固原州徐帽儿庄为匪案中马得鳌一案拿获的79名人犯及同庄50余户;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到十月,从安南逃回的1000余名厂徒及其眷属。三起安插户的总人数在3000—4000人之间。

④ 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第119页。

⑤ 《伊江汇览·船运》,《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辑》,第76页。

⑥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178《户部·屯田·新疆屯田》,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9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572,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甲子。

⑧ 参见佚名:《乌鲁木齐政略·武职》,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5—16页。

⑨ 《清高宗实录》卷1115,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酉。

⑩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典制》,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67页。

⑪ 《清高宗实录》卷660,乾隆二十七年五月辛丑。

兵3000名,亦实行携眷制,^①同年玛纳斯也改为携眷驻兵;^②乾隆四十七年(1782),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并喀喇巴尔噶逊三处1100名兵丁俱改为携眷制。^③到乾隆末年,北疆的绿营驻防官兵绝大部分改为了携眷制。粗略估计,随绿营官兵迁入新疆而落籍的绿营眷属约2万—3万人。

其次,鼓励绿营眷兵子弟分户认垦地亩,将其转入民籍。

在清朝,绿营兵属世兵制,籍隶军籍,掌于兵部,有定额,“父兄在伍,子弟为余丁,守兵缺出,即从余丁拨补,这样一代代地传下去,兵士都出于兵家”。^④在各地戍守屯田的绿营军,如果营中有缺额,则从成年的子弟中选补。但是绿营兵有定额,若缺额有限,而子弟又多时,为了生计,一些成年子弟便与父兄分户出来,认垦地亩,升科纳粮,由军籍转入当地民籍。清朝将新疆的绿营军渐改为携眷永驻时,为增加屯垦人力,也积极鼓励携眷兵丁家中的成年子弟,也就是“余丁”,与其父兄分户出来认垦地亩。对这些“余丁”的落籍政策,清朝采取的措施就是将其脱离军籍转入地方民籍。乾隆四十二年(1777),玛纳斯新到眷兵1100余户及家眷属4300余口,在进行安插时,内有眷兵子弟“情愿分户认地承耕”。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鉴于此,为减轻眷兵养贍之累,奏请将愿意承垦地亩的眷兵父兄子弟依照户民定例“拨给地亩,赏给农具、籽种、房屋、马匹、口粮等”,让他们垦种,按年升科。清廷允准了此请。于是索诺穆策凌将278名愿照户民例承垦地亩的兵丁子弟,按户拨地30亩,就近编入了玛纳斯民籍。^⑤同年十一月,索诺穆策凌在办理眷兵子弟分户垦种事务时,奏请如果眷兵内有愿呈请垦地者,准“照依户民之例,拨给地亩农具等项”,这样不仅于兵丁子弟生计永有裨益,“国家按额征赋,仍与招徕户民无异,直属两得之举”。^⑥乾隆皇帝对他的奏议非常认可,准许依此办理。

在清朝的鼓励下,绿营眷兵子弟分户认垦者很多。玛纳斯、古城、伊犁地区,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就有631户眷兵子弟分户认垦地亩而被编入地方民籍。^⑦这些从驻军系统中分离出来认种地亩的眷兵子弟,就是新疆的“兵户”,他们按户民例承垦土地,升科纳粮,已然成为新疆民籍中的成员。

三、乾隆时期移民落籍政策的影响

乾隆时期,清朝在新疆所实行的移民落籍政策对移民及新疆地区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

① 参见伍米泰:《奏为遵旨酌议伊犁屯田绿营兵丁改为携眷兵丁案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5辑,“故宫博物院”1986年版,第259页。

② 参见陕甘总督勒尔谨:《奏为携眷官兵全数出口折》(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0辑,1985年版,第259页。

③ 参见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派拨移驻眷兵起程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2辑,1986年版,第569—570页。

④ 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4页。

⑤ 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奏为筹办眷兵子弟分户垦种事》(乾隆四十二年元月初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0830-004。

⑥ 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奏为眷兵子弟分户垦种事》(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37-007。

⑦ 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第117页表格。

影响。

第一,实现了移民身份的转换。乾隆时期,内地的普通户民、商民、遣犯等陆续迁居新疆,清朝依移民来源、身份,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落籍政策。在政府的落籍政策下,这些移民都以不同方式加入了地方民籍,成为新疆新建构的地域社会的成员。

第二,充实人口,确立户籍。内地移民在新疆的陆续落籍很快补充了北疆因战乱而造成的人口缺失。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奇台、迪化、伊犁等地区落籍的内地移民约17424户,72000余人,^①至乾隆末年落籍移民人数已超过25万。^②这些落籍移民,组成了新疆户籍体系中的民户、商户、安插户、遣户等。虽然这些户别“同住不同群”^③属于不同的移民群体,但他们的落籍推动了新疆户籍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第三,屯田日辟,城镇发展。随着移民迁居人数的不断增加,新疆的农业屯垦规模越来越大,整个地区经济呈现出日渐繁荣的景象。据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乌鲁木齐的户民屯垦地已达905539亩,^④到乾隆末年,新疆总的耕地面积达130万余亩。^⑤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乌鲁木齐、伊犁、巴里坤等重镇逐步建立,并日益繁华。尤其乌鲁木齐,“初西番一小部耳”,经过十几年移民的休养生聚,民物繁盛,“烟户万井,阗阗鳞比,百货骈集,萃然一大都会矣”,^⑥其“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⑦伊犁地区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始驻兵屯垦后,陆续修建了九座城,内地户民接踵迁居,很快各城周围村庄环绕,“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内外,烟火相望,鸡犬相闻”。^⑧

第四,行政管理,日趋成熟。清朝对新疆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移民的不断入籍,逐渐由简约走向成熟。清朝对迁居的内地移民,在基层管理上最初采取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每里选立里长、渠长、保约。^⑨随着入籍人数的增加,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北疆各州县城乡已改行保甲制度,“所有安插户民并各营兵丁一切外来商客无论城堡居住,以及通衢小路山僻零星各户”,都被编入保甲,“十户设立牌头,十牌设立甲长,

① 据《西域图志》卷33《屯政二》第393页统计。

② 据《三州辑略》所载,新疆地区户民人数约为15.3万,如果加上《乌鲁木齐事宜·民户户口》中入籍的商民人口数和绿营兵丁及其眷属,人数应该超过25万。

③ “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行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者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各以户头乡约统之,官衙有事,亦多问之户头乡约,故充是役者,事权颇重。又有所谓园户者,租官地以种瓜菜,每亩纳银一钱,时来时去,不在户籍之数也。”(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点制》,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67页。

④ 参见阿桂:《奏为遵旨议奏酌减新增地粮事》(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录副奏折,档号:03-0568-063。

⑤ 户屯、兵屯、回屯之和。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研究》,第127页。

⑥ 《乌鲁木齐事宜·序》,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89页。

⑦ (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1,《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第1卷第117册,兰州古籍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⑧ 《伊江汇览·文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18页。

⑨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75,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乙丑。李大龙认为新疆民屯的基层组织形式是:甲一里一所一卫。每甲有民30户,10甲为1里,1里有300户;5里为1所,所有民1500户;2所为1卫,卫有民3000户。参见马大正等:《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十甲长设立保长，按户各给门牌填注男妇大小口数”。^① 在户民基层管理体制发展的同时，清朝在移民较集中的天山东麓逐步推行了内地的州县制。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天山东麓形成了道府州县制，且县级数量随着商、民日聚而逐渐增加。伊犁地区，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朝也为满足户民管理的需要，将兼管民人的理事同知改为抚民同知，管理地方事务，同时添设理事同知一员，办理各营刑名案件。^② 可以说，移民的落籍推动了乾隆年间新疆的行政建置日趋成熟，而逐渐成熟的行政建置又为嘉道时期移民的大规模落籍奠定了行政基础。

总之，乾隆朝通过实施积极的移民落籍政策，使不同的移民群体顺利转换了移民身份，加入到新疆户籍体系。这些落籍移民，快速补充了新疆社会恢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直接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乾隆朝的移民落籍政策为嘉庆道光两朝所继续遵循、发展，又促使嘉庆道光之际内地移民在新疆的落籍达到一个新高潮。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 书 讯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共同组织编辑，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三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15 年 10 月出版。

该书分设“一带一路”研究专稿、边政研究、边疆开发研究、边疆政权与民族研究、文献研究、动态与资料等栏目，所刊发 21 篇文章涉及广西、吉林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关系，准噶尔赴藏熬茶、云南边疆开发方案、归化城商贸、内蒙古沿边口岸、清代边疆遗产、三田渡满汉碑文、哈密图考及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书目、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书目等方面，有助于开拓学人研究思路、推动中国边疆学的发展。

① 海禄：《奏为新疆户口日蕃循例编排保甲情形事》（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十三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400-041。

②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1100，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辛亥。伊犁抚民同知，管理伊犁九城牲畜、煤窑税赋、钱局厂工及一切商民管理等事宜；而理事同知，管理惠远城、惠宁城满营及各部落等一切命盗逃脱各案及旗民交涉事件。参见《总统伊犁事宜》中《抚民同知应办事宜》与《理事同知应办事宜》，《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 245—250 页。